

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第九種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

The Tsiang Ting-Fu Collection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陳紅民 傅 敏 / 主編

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第九種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

The Tsiang Ting-Fu Collection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陳紅民 傅敏 / 主編

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全 24 冊 /
陳紅民，傅敏主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6
（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9）

ISBN 978-7-5633-8907-0

I. ①美… II. ①陳…②傅… III. ①蔣廷黻（1895～
1965）—人物研究—研究資料 IV. ①K825.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3664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桂林金山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開本：880 mm × 1 240 mm 1/16

印張：846.75 字數：13548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19600.00 元（全 24 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Treasures for Scholars Worldwide

前言

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是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典藏的「蔣廷黻資料」。爲便於讀者瞭解該資料的來龍去脈及史料價值，特做此前言予以簡要說明。

前言由四部分組成：一、蔣廷黻其人；二、蔣廷黻研究現狀；三、「蔣廷黻資料」的典藏與整理；四、「蔣廷黻資料」的史料價值芻議。

一、蔣廷黻其人

蔣廷黻是近代知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家、政治活動家。

蔣廷黻於1895年12月7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湖南寶慶府邵陽的一個中等農商之家。蔣家在邵陽並非望族。蔣廷黻的父親蔣恕學僅受過小學程度的舊式教育，繼而輟學，在靖港經商。他有經商的才幹，並熱心地方事務，樂於排難解紛，晚年曾擔任靖港商會會長。蔣廷黻後來雖未子承父業從商，但也受父親影響而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蔣廷黻六歲時，母親熊氏謝世，他童年的母愛主要來自寬厚善良的繼母。

對蔣廷黻人生前程影響最大者，係其二伯蔣蘭甫。蔣蘭甫孜孜向學，終因屢次落第而棄學從商，轉而寄望於晚輩子侄能博取功名。蔣廷黻六歲開始啓蒙教育，先就讀於蔣家私塾，接著再進趙家與鄧家私塾。在蔣蘭甫嚴格督促下，天資聰穎的蔣廷黻開始誦讀《三字經》、《四書五經》、《資治通鑑》等經典著作。家庭教育的熏陶與儒家經典的學習，爲蔣提供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也爲其日後的立世處事找到了部分安身所在。1905年科舉制度取消，切斷了傳統士子「學而優則仕」的道路。1906年，蔣廷黻到長沙進入明德學堂學習，開始接觸新思想與新觀念。不久，蔣廷黻又轉到基督教美國長老會在湘潭創辦的益智學堂，在此學習生活的時間長達五年，學習了基本的文化與科學知識，英文也有突飛猛進的進步。在益智學堂，蔣廷黻接觸了大量的西學，他的學識視野有了新的拓展，他對歷史的興趣與對西方（美國）的向往由此埋下了種子。其間，林格爾夫人（Mrs. Jean Ingle）對蔣廷黻關愛有加，不僅幫助他學習英文，還十分關心他的生活。

1912年2月，十七歲的蔣廷黻隻身踏上赴美國留學之途。經林格爾夫人舉薦，蔣廷黻進入位於密蘇里州的派克學院（Park Academy, Parkville

Missouri) 開始高中階段的學習。派克學院是一所半工半讀的長老教會學校，主要以培養從事傳教或教會相關工作的神職人員為職志。學習期間，蔣廷黻必須每天用三個小時的工作換取兩個小時的讀書時間。他專心於學業，英文、拉丁文進步神速，因幾何、代數、神學、歷史、拉丁文等課程皆獲優異成績而獲獎。在1914年6月的畢業典禮上，他又以英文最高分和最具創意的作文榮膺「農民銀行獎」。

1914年夏，蔣廷黻高中畢業後進入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在奧柏林，蔣廷黻修習德文、法文、英國文學、經濟學、進化論及心理學等課程，並首次接觸化學、生物學、樹木學等自然科學。他對自然科學產生濃郁的興趣，曾一度想專攻植物學，却由於發現有色盲而不得不放棄。自然科學而外，經濟學、心理學等課程也是蔣廷黻的興趣所在。優良的成績使他在大學二年級時獲得庚款獎助津貼，畢業前夕又獲得全美大專院校優良學生最高榮譽——「Phi Beta Kappa 學會會員」稱號。在奧柏林期間，蔣廷黻已經表現出對公共事務的熱情與組織才幹。他擔任過文學社團的聯絡秘書等職務，參與主編文學雜誌 *Oberlin Literary Magazine* 刊務，他還積極參與中國留學生的社團活動，出任中國同學會英文秘書、公共關係組負責人、奧柏林中國同學會會長等職。大學三年級，他負責籌辦中國留學生聯盟中西部第七屆年會，一時成為美國中西部中國同學會的領袖。

作為非官費生，蔣廷黻留學期間大部分生活與學習費用得靠工讀來解決。他的留學生涯幾乎與工讀相隨始終，工讀實踐也成為他獲取書本以外知識的重要途径。他靠演講、打零工及擔任社團工作來掙學費與生活費。為賺取中、晚餐及小費，他還在奧柏林學院附近的旅館餐廳端過四年的盤子，間或幫助度假去的教授看管房宅花園。1915年夏還曾嘗試在學院附近推銷書籍，結果是繞遍大街小巷却終無所獲。

1918年從奧柏林學院畢業後，蔣廷黻曾赴法國勤工儉學一年，主要職責是為赴法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華工服務。關於此次赴法的動機，蔣本人提及是應青年會一位朋友的邀請。後人綜合研究認為，有多種因素促成蔣的法國之行：一、賺取學費、生活費，以進入美東大學繼續研究；二、愛國心的發揮；三、實習法文和旅行。^①1918年7月蔣廷黻抵達法國，他被分派到里昂等地有華工的軍需廠，為華工開設俱樂部、教授法文和中文的補習班，放留聲機與電影等，還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工作之暇，蔣廷黻儘量在法國境內旅行，增加對歐洲社會（主要是法國）的瞭解，也對戰爭的破壞、西方的科技進步情形有了實地的體察。

蔣廷黻所讀的派克學院與奧柏林學院都有濃郁的宗教氣氛，但他本人却對宗教並無太大興趣，所以1919年他從法國再回美國後，選擇了位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蔣廷黻對自己的未來已經有所期許，他希望能選擇一個未來「能左右中國政治」的專業。最初，他想學新聞，後又轉向政治學，最後，選擇了研究歷史。他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並不純粹是為學術研究，而是想透過歷史研究獲取真正的政治知識。

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生活了四年，大開眼界，深受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薰陶，奠定了他未來的學術之路，乃至從政之路的基礎。1922年底，蔣廷黻完成了題名為「工黨與帝國：1880年以來英國工黨對英帝國主義政策反應之研究，以其代表在國會的輿論為主」(Labor and Empire: 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 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 的博士學位論文。該論文以英國工黨外交政策為討論主題，考察了1880—1920年間英國工黨對英帝國主義政策的反應，以及工黨如何調處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三者之間的理論與實際上的

① 黃德宗：《蔣廷黻及其政治思想的演變 1895—193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第123頁。

緊張關係。在學位論文序言中，蔣廷黻特別指出吉丁斯、沙費爾德和海斯三位教授對論文的指導與影響。1922年11月，蔣廷黻順利地通過了學位論文答辯。

蔣廷黻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擔任《中國留學生基督徒季刊》總編輯後厲行改革，將刊名改為《基督教中國》月刊，使刊物從形式到內容均發生實質性的變化。1920年7月，他繼晏陽初之後出任中國留學生基督徒聯合會主席，並擔任《中國留學生月報》副編輯、美國東部留學生會主席等職。這些活動提高了他的寫作演講水平，並歷練了他處理行政工作的能力，使他逐漸成為美國東部留學生界引人矚目的對象。

蔣廷黻在論文答辯結束後，當月下旬即踏上歸國的路途。1922年11月的《中國留學生月報》曾專發了一則信息：「前聯合會東部分會主席蔣廷黻將於二月23日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回國，在進入他雄心所在的政界前，蔣先生將先在教育界供職數年，他將入南開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可見，蔣是在歸國前已得到教授職位，他的歸國在留學生界是有些影響的。

在歸國的「女皇」號郵輪上，蔣廷黻與唐玉瑞舉行了婚禮，在船長的見證下完成了終身大事。唐玉瑞是清華學校招收的留學女生，為首批赴美的一百名女生之一，入哥倫比亞大學讀社會學，與蔣廷黻相識相愛。蔣廷黻學有所成，成家立業，甚是風光。

1923年春，蔣廷黻回到闊別11年的祖國。他沒有回鄉省親，而是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赴天津就任該校歷史系教授，擔綱西洋史、帝國主義擴張史、史學方法等課程的教學，並兼任歷史系主任、文科主任與校評議委員等職。

一帆風順的蔣廷黻面臨如何適應國內學術與教育界現狀的壓力。他赴美時年僅16歲，在外接受了二年系統的西式教育，其思維模式與價值取向基本是西方的，相較之下國學根基反顯得不够深厚。蔣廷黻從頭做起，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中文寫作水平進步頗快，儘管文字的書寫開始很蹩腳，偶爾也寫錯別字，但能清楚達意，收尾總是乾乾脆脆。蔣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用所學的西方知識選擇未來的研究課題，在學術界立足。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英國歷史的，這樣的課題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沒有多大的市場與共鳴。蔣廷黻最後選擇借用西方的現代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學術天地——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

當時，有關中國外交的權威著作是馬士（Hoscha B. 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主要是依據英國藍皮書和美國對外關係文件著成。蔣廷黻認為，馬士著作很少使用中國方面的材料，對制約中國外交活動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因而有其片面性。他決定從糾正西方學者的片面觀點入手，依據中方書面材料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研究中國外交史。歷史學是資料性極強的實證學科，掌握豐富的史料既是研究之基礎，也是創新的前提。蔣廷黻的研究工作即從搜集外交文獻開始，除去書面史料外，他還曾訪問一些當事人。張伯苓在經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撥款支持他的工作。這項開創性研究奠定了他在中國外交史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也確定了他一生的研究志趣。蔣廷黻自稱：「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①

1929年5月，蔣廷黻經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延攬，告別工作六年的南開大學到北京就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任。蔣廷黻在清華進入了他一生

① 《蔣廷黻英文口述》，載謝鍾建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97頁。

學術事業的顛峰階段，不僅個人研究突飛猛進，且對清華大學歷史學科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掌歷史系期間，銳意改革，延聘新人，改變舊的課程設置，打通中國史與西洋史之間的壁壘，每年歷史系開設的大約20門課程中，中外史課程幾近平分秋色。同時他鼓勵歷史系學生選修社會科學的課程，擴大視野。在他的努力下，清華歷史系逐漸形成以考據與綜合兼舉、中外史並重、注重對歷史整體理解的風格。清華歷史系成爲全國課程最完備的歷史教學中心，其師資配備亦是較爲強大之陣容，屬海內一流，人才輩出。

在研究方面，蔣廷黻繼續進行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他利用在北京的便利，去故宮博物院抄錄清宮檔案，購買許多清朝軍機處與海軍等方面的檔案，並向清末樞臣的後裔購買家藏的文件信劄等。他對多年搜集的史料進行縝密的鑒別與編排，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外交史專題資料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二卷，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與好評。蔣在編輯資料的基礎上，先後發表了一批識見獨特的論文，如《評〈清史稿·邦交志〉》、《琦善與鴉片戰爭》、《李鴻章——三十年後的評論》、《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隨著對外交史研究的深入，蔣廷黻的研究視野擴大到整個中國近代史，他曾設想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可惜終其一生，未能如願。

蔣廷黻有著關心現實政治的情懷。在南開大學執教期間，他常組織學生到天津郊區從事社會調查，瞭解民間疾苦。1923年底，蔣廷黻回到湖南老家，省親之外，實地考察了故鄉的社會變遷。1925年，蔣廷黻利用赴西北大學暑期班講學之際，考察了軍閥治下的西北農村社會經濟狀況。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蔣廷黻當年暑假偕友人遊歷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實地觀察南京政權的內政外交舉措與民衆對「革命」的反應，接觸國民政府的一些要人。蔣雖對南京政府的政策不以爲然，却抱有很大的期待。到清華教書後，蔣廷黻在北京與胡適、丁文江等志同道合者往來密切，形成一個特定的朋友圈，議論時政，並試圖影響國內政治的發展。

1931年，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國內形勢丕變。1932年初，國民政府聘請各界知名人士400餘位擔任國難會議委員，「共定救國大計」，蔣廷黻名列其中。但國難會議召開前，政府當局限定議題，近三分之二的委員拒絕參會。蔣廷黻却到洛陽赴會，對當局予以支持。幾乎同時，胡適、蔣廷黻等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覺得有必要對時政發表意見，以盡責任。蔣廷黻倡議辦個刊物研討中國面臨的問題，此議逐漸爲衆人所認可，胡適爲未來的刊物題名「獨立評論」。

1932年5月，《獨立評論》創刊號面世。編輯委員會由胡適負責，丁文江、蔣廷黻助理編務。刊物每週定期發行，一直到1937年7月25日北平淪陷前被迫停刊，共發行224期。蔣廷黻在1935年從政之前，是刊物的主要編輯與撰稿成員之一，其社會聲譽隨著刊物漸增的影響力而擴大。據統計，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共發表文章56篇（包括時論、譯著、遊記等在內），內容幾乎涉及南京政府當局內政外交的各個方面。蔣廷黻在《獨立評論》時期所表達的思想是「內政方面，通過新式獨裁、革除弊政、武力統一諸途徑以建立以南京爲中心的高效統一的政權，推進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外交方面，藉助國聯與國際，以中蘇關係爲重心的多元外交方略，低調抗日諸項以迂緩日益緊張的中日危機，換取內政建設必需的時間與空間，最終達到制日之目的」。^①

① 張玉龍：《蔣廷黻社會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96頁。

1933年12月，蔣廷黻在《獨立評論》第80號上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主張在中國實行「新式獨裁」。他提出，近代中國最大的障礙是政治分裂與政府腐敗。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建國與統一，要先經專制建國的階段，才能實現國家有效的現代化。此文一出，胡適即著文反對，形成了一場有名的「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卷入的學者眾多，甚至蔣介石也有公開通電涉及「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可見其影響之廣。受過完整西方教育的蔣廷黻居然提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憲政，需要「新式獨裁」，這一方面固然源於其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與蔣廷黻開始與當局接觸有關。1933年夏，蔣介石曾在廬山召見蔣廷黻，彼此留下良好印象，蔣廷黻認為蔣介石是位「態度極為得體」、「有堅強意志，對於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的國家領袖。^①次年年初，兩人再度在南昌行營晤面，商議對日和戰及憲法草案問題。故時人質疑蔣廷黻主張「新式獨裁」有曲意逢迎當局的意圖。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參與《獨立評論》與提出「新式獨裁」主張，為蔣廷黻由體制外轉向體制內提供了契機。

1934年夏，蔣廷黻決定赴蘇聯及西歐各國收集有關中國的外交史料。行前，他赴廬山與蔣介石見面，蔣介石吩咐他在蘇聯期間多加聯絡，以探尋聯蘇制日的可能性。這就使得原本的學術旅行非同一般，某種意義上他充任了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在蘇聯逗留數月，收集外交史資料及對蘇聯社會進行考察。他會見過蘇聯高級外交官員，向蘇方表達了個人對中蘇關係的看法及蔣介石的合作誠意。他曾致電蔣介石報告其在蘇聯的觀感。之後，他轉道去波蘭、德國、英國等國家。次年6月，蔣廷黻返回清華後，又專程赴南京向蔣介石報告歐遊經過，接下來就發生了題中應有的故事。

1935年11月，蔣廷黻接到通知去南京見蔣介石，談話中，蔣介石提出要蔣廷黻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先推說沒有經驗，最後還是承應下來，蔣介石當場寫了任命手諭。蔣廷黻在沒有回學校請假的情況下，就完成了從大學教授到政府高級官員的轉變，開始了其漫長的「學者從政」生涯。《行政院組織法》規定，政務處長係簡任，主要負責政策的制訂與研討，直接對院長負責。蔣廷黻上任後，試圖改變南京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他在行政院內建立行政效率研究會，出版《行政研究》會刊，提出了一套通過增刪裁併機構以增加行政效能的改革計劃。然而，蔣廷黻的改革方案遭遇阻力，蔣介石也不支持。不久，蔣介石就以駐蘇大使空缺為由，改派他遠赴蘇聯。

面對日本的侵略，「聯蘇制日」成為戰前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外交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蘇兩國1929年因中東路事件而絕交，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蘇均構成威脅，雙方均有改善關係制衡日本的需求。1932年12月，兩國外交關係得以恢復。因1934年蔣廷黻訪蘇期間曾就中蘇關係向蔣介石提的建議給後者留下了印象，蔣介石於1936年6月向中政會提議由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蔣廷黻的從政生涯方向再次轉變。10月21日，蔣廷黻奉命離國赴任，開始了為期僅一年多的短暫駐外大使生涯。

蔣廷黻赴蘇之際，中蘇關係雖有改善，但雙方依舊歧見紛紜，猜疑莫釋。南京政府要求蔣廷黻努力與蘇聯方面消除歧見，建立互信，期望能實現與蘇聯簽訂軍事互助協定，實現針對日本的「中蘇結盟」。然而，蔣廷黻根據親身觀察，認為中蘇兩國處境不同，希望蘇聯與中國結盟並不現實，但是他的判斷未被蔣介石接受。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南京方面判斷事變背後有蘇聯主使，命令蔣廷黻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蘇聯協助釋放蔣介石。蔣廷黻奉命提出的抗議與要求遭到蘇聯官員的斷然拒絕，雙方大吵，以致蘇聯反而向中國提出抗議。蔣的舉措失當使其大使生涯受挫，他在莫

^① 《蔣廷黻英文口述》，載謝鍾建譯：《蔣廷黻回憶錄》，第146—147頁。

斯科受到冷落，蘇聯外交部主辦的各種外交聚會基本不邀請他。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發，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蔣廷黻執行南京當局的指令，設法說服蘇聯出兵支持中國，未獲成功。此時，蔣介石需要蘇聯軍事援助甚切，蔣廷黻顯然不再是駐蘇大使的合適人選。1938年1月，蔣廷黻卸任回國。

在蔣廷黻駐蘇大使任內，還有件值得一書的事情，是他協助已在蘇聯15年的蔣經國攜蘇聯太太返回中國。

1938年5月，蔣廷黻應行政院長孔祥熙邀請，再次出任政務處長，主要負責戰時大後方財政預算及地方行政建設等事務，他也曾短暫代理行政院秘書長。國民政府在經濟困窘的情況下支援抗戰，需要將有限的經費用於戰爭，抑制通貨膨脹，支撐長期抗戰，穩固大後方。蔣廷黻根據「量入為出、量力而行」且保證「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原則編製預算。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中，蔣廷黻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五年，表現祇能用中規中矩、乏善可陳來形容。儘管很努力，但他編製的預算時常受到急於得到財政支援的地方官員與各部首長責難，行政改革更是設想多而成效少。部分原因是制度設計的問題，行政院政務處的設置「不甚合理」，「政務處長並沒有多少實權」。^①

1943年秋，蔣廷黻奉命率團到美國，出席在美舉行的有關「戰後救濟」的幾個重要會議。他在美國滯留了近一年時間，頻繁往返於美國的各大城市，拜會故舊，進行宣傳性與學術性的演講，爭取美國各界對中國戰後重建的支持。1943年底，旨在對遭受戰災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救濟與善後，幫助受害國及其難民減輕痛苦，儘快恢復正常和平生活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正式成立。蔣廷黻當選為「聯總」中央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常駐華盛頓，他爭取中國成為「聯總」援助預算的最惠國，並著手構想戰後中國的善後救濟具體計劃與要求。

1944年12月，「聯總」在重慶設立辦事處。次年一月，為協助「聯總」在華開展善後救濟工作，國民政府亦於行政院下設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蔣廷黻出任首任署長。「行總」最初設於重慶，抗戰勝利後遷至上海。「行總」的使命是辦理全國善後救濟，同時履行中國對「聯總」之義務。「行總」設有儲運、分配、財務、賑恤四廳，調查、編譯、總務、會計四處及人事室，並在各地設立分署或辦事處等辦事機構。蔣廷黻曾撰寫《中國善後救濟總署》一文，對「行總」的理念與職能詳加闡述，提出要「寓救濟於善後之中」，「以善後救濟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以善後先復蘇農業，並為未來工業化建設創造條件」等主張。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共產黨所在的解放區也需要救濟，蔣廷黻遵循「聯總」善後救濟物資分配超政治化的相關原則，主張本著人道主義基本精神對這些地區實施善後與救濟。

然而，善後救濟工作却成了蔣廷黻從政生涯中的一個滑鐵盧。戰後中國百廢待舉，政府當局的資源與組織動員能力均有限，而國共兩黨又各有打算，這一切使得善後救濟工作步履維艱。當「聯總」的大批救濟物資到達中國後，如何與「聯總」配合，順利接收物資並分配到所需地區，就成了蔣廷黻面臨的大問題。至1946年6月，「行總」的業務工作幾近癱瘓。「聯總」駐華300餘職員聯名向總部控告國民政府未遵守有關協定向「行總」撥款，且因政治原因不公平地分配物資，建議將計劃分配給中國的救濟物資分配到世界其他地方。「聯總」據此下達對華物資「停運令」，此事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蔣廷黻受到極大衝擊，遭到監察院彈劾，於10月被迫去職。

① 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38頁。

1946年秋天，蔣廷黻被任命為出席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會議的中國代表。1947年6月，他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在上海與碧瑤召開的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一、二屆年會。同年9月，國民政府任命蔣廷黻接替因病去職的郭泰祺任駐聯合國常駐代表。蔣廷黻肯定沒有想到，這一任命確定了他後半生的基調：從此長期生活在域外，成為職業外交官。至1962年，蔣在聯合國任中國代表團（1949年後代表臺灣當局）重要職務長達15年。

當時國共內戰正酣，中國在聯合國鮮有作為。此時，蔣廷黻個人婚姻却亮起了紅燈，鬧成大緋聞。蔣與結髮妻子唐玉瑞婚後生有二男一女，却移情別戀，與下屬之妻沈恩欽暗生情愫。蔣廷黻要求離婚，唐玉瑞不許，蔣便委託律師在墨西哥法庭單方面辦理了離婚手續，並與沈恩欽於1948年7月結婚。唐玉瑞先向紐約的法院提出離婚無效的訴訟，未被受理，就將糾紛鬧到聯合國，以「鬧場」的方式給蔣廷黻難堪；但凡蔣出現的各種公私場合，如開會、演講、宴會等，唐均到場，使蔣難以正常工作。曾經的恩愛夫妻勞燕分飛。然而，蔣廷黻對前妻的情感很複雜，在臨終前預留的遺囑中提出，將所有約三十萬美元的遺產一分為二：一半給現夫人沈恩欽，一半給從不認為已離婚的唐玉瑞。蔣廷黻喪禮時，沈、唐二人同時出席，且是唐玉瑞以「未亡人」身份率子女（蔣與沈恩欽婚後未生育子女）在報紙上發表傳統的「哀謝啓」。

蔣廷黻長期駐於海外，這給了他遠距離觀察國內政治，思考如何改造的機會。早在1945年蔣廷黻就有另組一個政黨的想法。1947年初，蔣廷黻與胡適見面時，對國民黨表達了強烈不滿，商談建立新黨的可能性。1948年底至1949年初，蔣廷黻對國內政治徹底失望，再與胡適商議組黨之事，確定了建黨的發起人，黨名定為「中國自由黨」。蔣廷黻親自擬定「中國自由黨黨綱」，並於1949年11月在美國召開記者會，在《紐約時報》宣布了組黨的消息。1949年1月，在臺灣出版的《自由中國》發表了《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然而，由於胡適不肯出任新黨的「黨魁」，加之國民黨政權撤臺後形勢巨變，新黨最後胎死腹中。^①組建「中國自由黨」是蔣廷黻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而寓意深長的事件，說明了他與國民黨政治體制的關係。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廷黻在第四屆聯合國大會上代表臺灣當局提出「控告蘇聯侵略中國案」（「控蘇案」）。此案將中國的政權更替說成是「蘇聯侵略」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新政權是蘇聯的「傀儡」。國民黨政權提此案有雙重目的：一則公示蘇聯是「敵對國家」，阻止蘇聯提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的席位；二則幫助國民黨解圍，說明其失去政權不是自身的政策失敗，不是敗於中國共產黨而是敗於強大的蘇聯。因為「控蘇案」背後有特殊作用，它便成了20世紀50年代初蔣廷黻奉臺灣當局旨意每年都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提案，1952年竟然獲得大會通過。蔣廷黻由此被島內媒體描繪成在聯合國孤身舌戰蘇聯「強權」的「外交鬥士」與「英雄」，聲名大噪。^②

從1950年海峽兩岸對立局面形成後，實行「一國一票制」的聯合國席位對於困守孤島的臺灣當局來說，對內對外均有重要的意義，非殊死以守不可。蔣廷黻長期在聯合國擔任臺灣當局的重要職務，還多次任臺灣當局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的「團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宣達臺灣當局的主張，捍衛臺灣當局在聯合國佔有的中國代表權，用各種方式阻止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在1960年之前始終被臺灣當局與美國

① 關於蔣廷黻與中國自由黨的關係，詳見拙文《蔣廷黻與跌宕的「中國自由黨」（1947—1951）》，載《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一期；《政權交替之際的知識分子：以蔣廷黻籌組「中國自由黨」為中心》，載《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外交》（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② 張玉龍：《一個外交鬥士的老去》，載《傳記文學》，第7卷第9期，第二頁。

聯手以「緩議案」的形式阻止進入大會討論，臺灣當局才得以佔據聯合國的中國席位。這固然是美國大力支持的结果，但蔣廷黻等人在聯合國內的「奮鬥」也起了一定作用。1953年、1956年蔣廷黻兩次返臺述職時，均受到了熱烈歡迎，當局授予他「卿雲勳章」，以示嘉獎。

1957年，蔣廷黻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這是對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成就的充分肯定，但也與臺灣的「學術生態」有關。1948年首次院士選舉時，蔣廷黻曾獲得提名，但未當選。事實上，此後蔣廷黻已與學術研究漸行漸遠，並無值得稱道的新研究成果。1962年，蔣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董事，倡導臺灣地區的學術研究及中國通史之編纂。

隨著國際局勢與聯合國內格局的不斷改變，中國代表權問題在1961年發生重要轉變，由「緩議案」變成了「重要問題案」，即允許提交大會討論，但需三分之二成員國同意。臺灣當局遭受了一定挫折，採取了換人策略，重新布局。「駐美大使」葉公超被撤，由蔣廷黻接替。由於「對美外交」是臺灣「外交」最重要的一環，基本是由最高當局直接操盤，故蔣廷黻在「駐美大使」任上，無甚大作為。1965年5月，他從「駐美大使」任上退休，轉任「總統府資政」閒職。

退休後，蔣廷黻移居紐約，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他個人的「口述歷史」。有回憶文章稱，蔣廷黻本擬返回臺灣居住，繼續從事歷史研究工作。但筆者存疑，因蔣廷黻自1949年至1965年的16年擔任重要的「外交」職務，却祇回臺灣四次（1953、1956、1961、1964），每次時間均不長，終生不入國民黨，似乎是刻意與當局「保持距離」，很難想像他解除公職後，會離開熟悉的美國而到基本陌生的中國臺灣度過晚年歲月。

1965年10月9日，蔣廷黻病逝於美國紐約，享年70歲。他在自己的祖國生活了不到40年（包括童年），而在外國生活了超過30年（美國前後30年、蘇聯1年多），如果以成年以後計，則他一半以上的時光是在海外度過的。

二、蔣廷黻研究現狀^①

蔣廷黻以學術研究起家，之後從政，是知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家，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民國以來學者從政最有成就的一位」^②。他的一生頗為奇特：作為一個中國人，他長期生活在國外，學貫中西；以學者論政起家，却最終以行政、外交為職業；信仰與努力宣傳自由主義，却在被批評為「獨裁」的國民黨政權內任高級官員；經歷1949年的巨變而長期擔任國民黨政權的高級官員，却終生未加入國民黨。凡此種種，均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之處。

正因為他在學術史、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上均有一定的位置，學術界對他頗為關注，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臺灣地區與海外方面。臺灣學界對蔣廷黻的介紹與研究起步較早。蔣廷黻在世之時，李敖即於1963年發表了《蔣廷黻和他走的路》（《文星》雜誌，第12卷第6期）一文，並著手編輯《蔣廷黻選集》。蔣廷黻去世不久，與他有30年交往的好友陳之邁在1967年將其《傳記文學》連載的文

^① 關於蔣廷黻研究學術史，張玉龍教授在《蔣廷黻社會政治思想研究》一書中有精彩的歸納，此處參考了張教授的成果。

^② 謝鍾健：《譯者序》，載《蔣廷黻回憶錄》，第一頁。

章結集出版為《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一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述蔣之經歷甚詳，史料價值很高。史學家吳相湘則在《民國百人傳》中為蔣廷黻立傳。以上著述對蔣廷黻的志業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並有各自的評價。

臺灣地區的幾位青年學者關注到蔣廷黻研究，先後選擇以蔣研究為學位論文的主題，其中有葉振輝的《蔣廷黻與中國外交——特別著重1947至1961年之時期》（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從學術研究和外交實踐兩個方面重點考察蔣廷黻在外交上的貢獻。張慧中的《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以蔣廷黻的近代史研究作為剖析對象，兼而論及其求學、論政與從政時期的思想演變。黃德宗的《蔣廷黻及其政治思想的演變1895—193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以蔣的早期生長環境與教育、留美前期（1912—1918）、留美後期（1918—1922）、回國以後等幾個時間段來分析蔣政治思想的變化。

臺灣地區學術期刊的論文有王聿均的《蔣廷黻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近代中國研究通訊》，1986年第1期），論述了蔣在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傑出貢獻。林文仁的《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99年第31期），認為蔣廷黻思想上存在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學術或政治為志業，對歷史研究之學術與功能等三重交錯，這種思想特性與蔣廷黻的外交活動表現出一定的互動。此外，林子侯著《蔣廷黻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7年）是一部傳記作品，對蔣一生的諸多方面均有涉獵，但缺乏深入研究与剖析。若干以思想史為主題的學術專著也涉及對蔣廷黻的評價，其中陳儀深的《〈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一書以相當篇幅專論蔣廷黻的「獨裁論」主張，認為該主張與蔣廷黻對30年代國際國內政局情勢的判斷及其思想中固有的「保守」性有關。

臺灣地區還出過不少回憶文章與一般性的介紹文字，如曹志源的《愛國學人蔣廷黻》（《「中外」雜誌》，1983年12期），梁嘉彬的《蔣廷黻先生傳》（《湖南文獻》，第17卷第4期，1989年4月），王宏志的《蔣廷黻傳》（《「國史館」館刊》，第4期，1988年6月）及周谷的《蔣廷黻暮年在華府（上下）》（《「中外」雜誌》）等。

中國香港出版的《中國研究》1996年第一期刊出陳永紅的《蔣廷黻的現代化思想》，對蔣廷黻現代化理念之思想動因及其基本內涵作了相應的梳理，歸納出蔣現代化理念的基本特性。

日本學者湯本國穗的《專家政治との民衆包攝——蔣廷黻を中心に》（千葉大學法學論集，1994年），從專家政治的角度探討了蔣廷黻棄學從政的思想動機及其政治實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與方法論意義。

美國學者查爾斯·里利（Charles Ronald Lilley）的《蔣廷黻：介於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Tsiang Ting-fu: Between Two World, 1895-1935*）是他1979年在馬里蘭大學的博士論文。^①里利的論文利用蔣廷黻留學時期的大量資料，借用「跨文化交際」（Cultural borrowing and cross-

^①「蔣廷黻資料中」有一份1973年12月，哥倫比亞大學的查爾斯·里利寄給蔣居仁的博士論文提綱，題目為「蔣廷黻：1900—1940年間美國與中國的社會、文化關係研究」（*T. F. Tsiang: A Study of American-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e Relationships 1900-1940*），單從題目看，他6年後完成的博士論文與最初的設想相比有很大的變化。

experience) 的方法，對蔣廷黻的基督教信仰、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進行多方面考察，強調蔣廷黻的積極入世態度和知識批評能力成熟於留美時期，他在奧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師承和研習，美國的影響為蔣廷黻日後的思想行為奠定了基礎。之後，里利又以「蔣廷黻：局內的局外人」為題發表其對蔣廷黻的見解，精闢地以「局內」與「局外」來界定蔣的身份：蔣廷黻晚年是臺灣當局的高級「外交官」，却長期居住在美國，甚至被蔣介石看成是「一個親密的具有影響力的外國人」，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在國民黨政權之內還是之外，他都被視為「局外人」，他努力奮鬥要進入「局內」，可即使是成功之後，他發現自己「依然不過是個局外人」。^①哈佛大學歷史系的 Wing F. Ng 2002 年提交的碩士論文《代表權：「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席位，1950—1971》(The Right to Represen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 Seat, 1950-1971) 的第二章標題是「蔣廷黻與 1950 年中國代表權危機」(T. F. Tsiang and the Crisis of Chinese Representation, 1950)，其中較多運用了蔣當年的日記。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相當長時間「革命史觀」當道，蔣廷黻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者」，其所著《中國近代史》是「集中外反動觀點之大成」，「宣傳民族投降主義，為買辦資產階級蔣介石集團作辯護」。^②這段時間的文章，包括吳文燦的《批判蔣廷黻的反動歷史觀點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歪曲和誣蔑》(《河南師院學報》，1956 年創刊號)、金應熙的《批判洋奴買辦蔣廷黻的反動史學觀點》(《中山大學學報》，1961 年第 2 期)。祇看題目即知內容是對蔣的全盤否定與批判。

20 世紀 80 年代後，學術研究氛圍相對寬鬆。1986 年陳旭麓撰文《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文匯報》，1986 年 9 月 16 日) 對蔣廷黻著述的學術價值給予某種肯定。1987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的「人物傳記」第 22 輯中，也有《蔣廷黻》一文，對蔣的生平進行簡要評價。這些介紹開啓了學者研究蔣廷黻的視窗，有不少學者隨之步入此領域。目前所能見到的成果包括：王永平的《對中國近代化悲劇的反思——讀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博覽群書》，1988 年第 3 期)、劉耀的《蔣廷黻的「全盤西化」說與中國近代史》(《社會科學戰線》，1989 年第 2 期)、顧衛民的《評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教育學院學報》，1989 年第 3 期)、任駿的《蔣廷黻與七七事變前後的中蘇關係》(《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抗戰前蔣廷黻的內政外交主張簡述》(《民國檔案》，2004 年第 4 期) 及《胡適與蔣廷黻的政治主張之比較》(《史學月刊》，2006 年第 2 期)、林冠群的《評蔣廷黻的鴉片戰爭史觀》(《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3 期)、呂文浩的《清華學人之五——蔣廷黻在清華歷史系》(《文史精華》，1999 年第 3 期)、沈渭濱的《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4 期) 及《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李義彬的《三十年代的蔣廷黻與蔣介石》(《百年潮》，1999 年第 2 期)、李建軍的《蔣廷黻的外交史觀》(《安徽史學》，2000 年第 3 期)、許紀霖的《瓷器店中的猛牛》(《讀書》，2000 年第 8 期)、歐陽軍喜的《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2 期)、王憲明的《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學術影響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學」及馬士的影響為中心》(《河北學刊》，2004 年 7 月)、尤小立的《從著作和回憶錄看蔣廷黻的思想和行為取向》(《江蘇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蔡樂蘇、金富軍的《蔣廷黻外交思

① [美] 查爾斯·里利：《蔣廷黻：局內的局外人》，載《檔案與史學》1999 年第 3 期，第 74 頁。

②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資料編譯組：《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年，第 11 頁。

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張海鵬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的第三章第一節「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龔雲執筆），高志勇的《試析胡適與蔣廷黻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爭》（《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龔滿紅、呂霞的《蔣廷黻的選擇：從外交史家到外交家》（《歷史教學》高校版，2009年第5期），王春龍、盧旗英的《蔣廷黻對創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貢獻》（《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吳躍農的《蔣廷黻向蔣介石提出「聯蘇抗日」始末》（《文史春秋》2013年第4期），等等。

學位論文方面，有南開大學李建軍的碩士論文《畢其功於一役 走出「中世紀」：論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年），華東師範大學宋俊的碩士論文《蔣廷黻史學研究——兼論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兩種範式》（2006年）等。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一些學者將相關的研究成果用博客的新形式發表在網站上，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勇研究員就在新浪、網易上發表過《蔣廷黻與近代中國敘事》（2013年4月1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7de870101jk87.html），《蔣廷黻眼中的中國近代史》（2013年6月20日 http://blog.163.com/ryt_6666/blog/static/1839260672013520453370/）等。

以上研究成果，論述的焦點均落在蔣廷黻的學術研究上，對蔣廷黻成果的評價大致上分為基本肯定與基本否定兩種。持基本肯定觀點的有陳旭麓、沈渭濱、許紀霖、顧衛民、歐陽軍喜、馬勇諸學者，如陳旭麓認為，蔣廷黻在歷史的推進中感知了以「近代化」來改變「中古」的面貌這個「歷史邏輯」，因而也就能觸及近代中國的這個總要求。歐陽軍喜認為，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西方文化背景，同時又是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化環境的產物，他是希望通過近代史研究在解救當時的民族危機方面能有所貢獻。沈渭濱認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不僅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亦可窺見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人，思考國家前途、關懷社會進步、主張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態。李建軍認為，蔣廷黻不僅釐清了「華夷之辨」與近代民族主義的關係，而且刷新了中國固有的「忠奸之辨」與近代愛國主義關係的傳統觀念。許紀霖認為，蔣廷黻實際上可歸屬於社會自由主義者，他在思想性格上趨向宋儒，其棄學從政屬於為政治而生存，其理想目標是做范仲淹或王安石。王春龍、盧旗英肯定了蔣廷黻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順利誕生及促使它對中國進行大力援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勇認為，蔣廷黻的研究「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分析框架和話語系統，是近代史科學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不經意間將近代史學科帶入一個新的境界。」

持基本否定觀點的學者是林冠群與龔雲。林冠群認為，蔣廷黻在研究鴉片戰爭時，將民族矛盾與民族自我更新問題混為一談，兜售「失敗主義」的立場，《琦善與鴉片戰爭》中的基本論點是站不住腳的。龔雲指出，蔣廷黻所寫的《中國近代史》「是一種政治性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是一部宣傳品，而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其他如陳哲夫等主編的《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流派》（當代出版社，1999年）有萬餘字的篇幅涉及蔣廷黻的政治思想，基本是予以批評。易竹賢的《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論及「民主與獨裁」之爭時，認為蔣廷黻等鼓吹「新式獨裁」，有公然迎合蔣介石的意願。

在研究蔣廷黻的學者中，張玉龍教授值得特別稱許。他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期間，選擇以蔣廷黻研究為博士學位論文，先後發表過《蔣廷黻研究述評》（《雲夢學刊》2004年第2期）、《關於抗戰前蔣廷黻秘密訪蘇的探討》（《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蔣廷黻「新式獨裁」主張

歸因再論》（《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蔣廷黻的外交理念略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9月）、《蔣廷黻國聯觀略論》（《歷史教學問題》2007年第6期）、《蔣廷黻留美時期政治思想略論》（《東南學術》2007年第6期）、《書生之見：獨立評論時期蔣廷黻對日言「和」主張述論》（《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體制內自由分子與戰後中國自由主義政治運動——以蔣廷黻、胡適、顧維鈞為中心的考察》（《東南學術》2008年第5期）、《尋求危機的轉圜：蔣廷黻與東北問題述論》（《東北史地》2009年第2期）、《抗戰勝利後體制內自由主義政治運動的特點》（《歷史檔案》2008年第4期）等系列文章，涉及蔣廷黻研究的主要方面。2008年，他的博士論文《蔣廷黻社會政治思想研究》經過認真修改後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首部全面論述蔣廷黻思想的學術專著，得到很好的評價。著名民國史專家張憲文教授評論道：「該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該領域的研究空白，深化了蔣廷黻的研究』。

與研究的發展相適應，部分蔣廷黻的相關資料也陸續被編輯出版。蔣廷黻逝世不久，臺北的文星書店便於1965年12月將其在各個時期的文字編輯成冊，出版《蔣廷黻選集》（1978年再版）。雖因成書倉促，有諸多遺漏（特別是早年美國留學所寫的文字未納入），但這是首次結集出版的蔣廷黻資料，功不可沒。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六集的《蔣廷黻選集》。1970年臺北的大西洋圖書公司出版了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論集》。1979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將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以「蔣廷黻回憶錄」為題翻譯出版。天一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一套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術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史料叢書，其中包括三冊本的《蔣廷黻傳記史料》，基本將臺港地區已刊的各類蔣廷黻材料收羅無遺，十分難得。1987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書社、東方出版社等出版了不同版本的蔣廷黻著的《中國近代史》，湖南教育出版社於2008年出版了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其他如《獨立評論》影印本、《胡適的日記》等相關資料的問世，為蔣廷黻的研究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便利。

概言之，學術界對蔣廷黻的研究自其逝世時的20世紀80年代就逐漸展開，有一批研究成果，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回顧學術史，可以看出，學者對蔣廷黻的關注多集中於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獨立評論》時期的言論、學者從政、駐蘇聯大使時期的作為，及其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國家社會中的角色等幾個方面。同時，研究時段基本集中於1960年前，而對其最後駐於美國的16年鮮有論著關注。對於蔣廷黻這樣一位活躍於政治、外交、學術等不同領域且有所建樹的複雜歷史人物而言，現有的研究及資料顯然均不足以反映其全貌。在此試舉一例，前文提到清華大學蔡樂蘇教授等曾於2005年發表論文《蔣廷黻外交思想探析》，該文所探析的年代基本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為止。而此後直到1965年蔣廷黻去世，蔣的主要職業之一就是外交官，擔任「駐聯合國代表」與「駐美大使」，其外交思想與實踐遠比此前要豐富得多。

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強調首尾連貫，尤其應當注重對人晚年的評價，所謂「蓋棺論定」。對蔣廷黻晚年研究的缺失，實際上也影響到對他前半生的評價。

之所以產生上述遺憾，除了學者視野受到社會與學術環境的限制以外，資料的缺乏是重要原因。歷史學在本質上是一個實證學科，史料是研究的基石，沒有史料，歷史學家就會「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相比於在中國時的風光，蔣廷黻晚年「自我放逐」的隱居生活，漸漸淡出媒體的視野：離開中國後他長期居住在美國，即使與臺灣的老友聯絡也不多；他基本局限於在美國做「外交官」，與學術界也漸行漸遠。20世紀80年代之後，蔣廷黻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視野之中，甚至有一定的熱度，然而，其後半生系統史料的缺乏，不僅影響了現有研究成果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研究深入的障礙。